

李 丹 杨匡满 著



五环旗
下 的
追悔

五环旗下的追悔

五环旗下的追悔

李丹 杨匡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19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1246-1/I·899 定价: 2.85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入三部纪实文学。

中国女排从汉城奥运会归来后，关于它的“内幕”沸沸扬扬，真假难辩。“五环旗下的追悔”是作者采访了一大批有关人员，首次详尽披露了中国女排从鼎盛走向滑坡的曲折历史，权威地介绍了女排失利的真相。“挑战者”写的是有名的铁面汉子、中国足球队主教练高文丰出任之前的故事。“冒牌登山队员的传奇”是作者自述随同中国、伊朗联合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下的奇特的经历。

目 录

五环旗下的追悔.....	(1)
挑战者.....	(66)
冒牌登山队员的传奇.....	(102)

五环旗下的追悔

五环旗从汉城徐徐降下。一个偶像从国人的心中蓦然倒塌。这个稳稳坐了八年的偶像便是中国女排。女排这块金牌对于一九八八年的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特殊的份量。似乎别的输了都可以原谅，独独女排输了不能原谅；似乎火车出轨、飞机失事都可以解释，独独女排失手无法解释。如果由女排来给出征汉城的壮士划一个句号，国人多少会感到一种安慰。龙年从来是难以捱过的，龙年常常凶多吉少。但女排在这个戊辰跌倒，则是出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意料的。诚然，女排早晚要输，但不应是这个时候，不应是这样的输法。

当无可改变的结局通过电视屏幕强迫人们接受的时候，有人愤怒，有人绝望。愤怒本身也是出于绝望。一九八八年里本来叫人愉快的事情就不多，人们期待着从汉城奥运会上获得一剂兴奋药，好使客厅里、餐桌上少一点牢骚，多一点光明的谈资；而汉城奥运会点火以来国脚国手们佳绩寥寥，人们更把女排视作最后的看家的一张王牌。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

“输光了才好！”这是赌气和发泄。但这种说法也对：只有输光了才有理由推倒重来。不然，女排这面永放光芒的金牌可以掩盖许多东西。

“这不是我见到的中国女排。一定是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的话一针见血。

最伤心的是那些沉默的人。那些并不怎么懂体育却八年如一日痴情于女排的人。最伤心的自然还有那些心甘情愿地委身于排球事业的中国姑娘们，以及跟她们同命运的男子汉们。

对于更多一些人来说，愤怒和绝望之后，是会谈和平静，是不加思索的评判和道听途说的议论。既然作为偶像的女排已成为历史，他们渴望了解一点女排之所以失败的“内幕”，这是很自然的。

一 女排失利“内幕”引起的一场大波

“轰动效应”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时髦。抓住人们急于了解女排失利症结所在的心理，一些小报开始登载了他们的“独家新闻”。没“独家”可登的，也纷纷转载。一时间，“女排失利有一个内幕”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甚广。

由于我们的新闻透明度不高，长时期来相当多的读者习惯于把大报看作官样文章而认为小报才能透露真情，因而很大程度上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更容易受小报的影响。

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以目击者的口气，对女排比赛的现场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比如：有篇文章这样描写袁伟民：“比赛一结束，记者们呼地一下先把坐在场外的袁伟民围住了。袁依然不失平日之潇洒，笑着推开众多的话筒和录音机：‘你们请教练谈，请教练谈’。”

“从‘三连冠’之后，袁伟民再也不愿意管女排了。中国女排给了他巨大的荣誉，中国体育界没有一个教练的声望能达到他这样的高度，今后也难再有。”

“中国女排同时也给了他巨大的压力。他原来很少抽烟，可一到比赛场，他便一根接一根地抽。他是个善于把紧张隐藏起来的人，但是心电图已显示出他心律不齐。”

比如说，有文章这样写到杨锡兰：

“9月27日晚，中苏女排之战后的记者招待会。

“这时，杨锡兰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她选择了左边偏中间的位子坐下，把腿搁到椅子上，把卷起的裤角抹下来，然后把扎起的头发一松，披在肩上。

“这一切完成得自然、从容、轻松，笑容一直挂在脸上，丝毫看不出有一丝痛苦和难受，哪怕是沮丧。”

至于张蓉芳呢？

“中国女排在汉城的三场重要比赛，对美国、秘鲁、苏联，作为领队的张蓉芳没有一次与教练李耀先、董传强坐在一起。

“当中国女排一败涂地的时候，我看见她脸上的笑容。

“这难以置信的笑容，出现在她脸上不止一次，也不只出现在她一个人脸上。场上场下，都有人在这样放肆地纵容自己的情感。

“只有荣誉过剩的人，才会拿数亿人都盼望的荣誉不当一回事。”

与袁伟民的“潇洒”、杨锡兰的“旁若无人”迥然不同的是“让人看了难受极了”的“尴尬”的李耀先。李耀先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权；李耀先早就想对女排搞“大换血”，但被“袁头”否决了，李耀先不是不抓训练，而是老队员既有伤病又不好管。那意思很明白：李耀先从袁伟民手里接过的队伍很不怎么样。

“第一次训练中，老队员们一会说‘袁指导不是这样的！’一会又说‘袁指导不是那样的！’于是，李耀先按袁指导的老办法让冠军们练了一下。可是，她们早已不是当年的她们了。只半堂课，老队员全累趴下了。”“李耀先对一个知心记者摊开双手：‘没有人训练，我怎么办？抓训练质量，抓训练水平，她们不练，这不是无米之炊吗？老队员来请假，你做思想工作，她们说着说着还掉了泪，你教练怎么办？老队员哪有没伤病的，训练哪能不疼？都要咬着牙上，不这样不行！

“由此又产生了中国女排独有的现象：上场的队员不训练，训练的队员不能上场。”

但李耀先做不了这个主，“调整阵营的事他甚至连提也不敢提。”

“他曾对好友说过这样推心置腹的话：‘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赢了，功劳不是我的；输了，责任一定是我的。’

‘奥运会每场比赛的准备会，你看袁头都参加，我什么权力也没有。’”

.....

这些内幕在广大读者和体育界掀起了一场大波。

由于作者以现场记者的资格来“纪实”，还由于中国人历来有同情弱者的习惯，一时间，街谈巷议，沸沸扬扬，责骂讨伐之声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卷进这场大波中的人物是形形色色的。有的人真心地反思女排失利原因，但苦于得不到第一手材料，只好相信那些辗转相传的“内情”；有的人有中国人“围观”的习惯，想看好戏，出出气，或者嚼嚼舌头；有的人出于新闻猎奇想造成“轰动效应”；还有人则是想多少推卸自己的责任……

这场大波甚至使新华社的通稿黯然失色。连一些长期关心女排的人士都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似乎中国女排的真真假假，成了奥运会后的又一股浪潮。

五个球迷致书张蓉芳：

“你从前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你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伟大的！但是，我们发觉这是个骗局。

“我问你：女排在汉城关键一仗打输了，你为什么笑了？亏得是你还笑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心中偶像的‘表态’——可耻！

“你现在不打球了，升官了（我们一向对运动员退役后

当官特别反感；你有技术，为什么不去当教练？！）但你去女排是什么态度？你对李耀先教练是什么态度？

“请你转告袁伟民：一个中国人说过的话如不照办就是非君子。他说过不干涉女排的事为什么又插足，使李教练施展不开本领？！这样的人，球迷都讨厌，一个爱国者也讨厌！

“我们喜欢郎平！

“我们支持李教练！不准你们干涉他工作！否则……”

一位老先生致书国家体委负责人：

“袁伟民，你对存在‘骄娇’二气的中国女排在训练上负有什么责任？为什么当你晋升之后，邓若曾被迫去了山西，傻瓜李耀先承担教练后而不能有所作为？你带的队伍，为什么别人不能再带？在‘日本杯’的比赛中由于未得你的干预而以三比一胜苏联队，难道是巧合吗？国家女排这个阵地给你的荣誉、地位、金钱早已超过你当初渴望得到的东西，‘失街亭’的诸葛亮当能识时务而自贬戴罪立功。”

……

人言可畏！

1月14日，中国排球界的几位权威人士和女排领队教练一起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意在听听三位即将离队的教练还有什么意见，同时也议一议报纸和社会上种种叫人真伪莫辨的舆论。

会上，资深人士、身任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和亚洲排联竞赛委员会主席的钱家祥对小报上的一些报道感到很生气。

“这种混淆视听的文章，使我们排球界背了很大的黑锅。对

我们的工作很不利。”“报纸上点名说是李耀先说的，你怎么说的？建议你给我们讲讲清楚。不然把我们都臭在里头了。”

李耀先作如是解释：“第一我不认识他（《梦断汉城》一文的作者）；第二我从没有接待过他；第三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类似的话我说过，但观点是不一样的。”

李耀先、董传强、程蜀琦三位教练均表示从未提出过“大换血”的问题，也不存在袁伟民不给权的事。

1月16日，中国女排举行送别会。几乎包括全部主力在内的七名老队员退役。这之前，中国女排曾举行过多次欢送会，但都是在胜利之后，唯有这次是在失败之后。唏嘘饮泣之声自不待言。会上，同样有队员要求李耀先澄清一些事实，否则她们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李耀先的解释还是那些话。

皮球踢到了李耀先脚下，而李耀先把它踢到了场外。这就耐人寻味了。

笔者无力去解李耀先留下的谜。没有录音、文字作依据，凭两张嘴，你这样说，他那样说，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但女排滑坡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主要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这是笔者力求探寻的。

1月底的某一天，笔者约请《梦断汉城》的作者、《解放军报》记者张挺来一起“侃侃”。张挺因故未能践约。两天之后，笔者同他通了一次电话。我直截了当地问张挺：“汉城那场比赛，你在不在场？”

张挺答说：“在场。我同几个记者一起交谈过对那场球的印象。我是根据那些印象写的。”

“那么你是否直接采访过李耀先？”

“没有。但我是听李耀先的一位好朋友讲的。这点错了！”

张挺说，张蓉芳刚刚找他去谈过话。他自己没想到体委有一股“倒袁”的风，他的文章正好在这个时候出来。他准备过一段再写篇文章澄清一下。

笔者又问：“依你现在的观点，女排失利的主要责任在谁？是不是可以说，从大的抽象的讲，是我们这个民族赢不起也输不起；从具体方面讲，主要责任在李耀先？”

张挺当即表示：“我也是这个看法。”

张挺这一看法已同自己在不足一个月前文章中的观点大相径庭。难道张挺也留下了谜？

从《兵败汉城》到《梦断汉城》所披露的中国女排的“内幕”，使得某些至今热爱着女排的人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困惑。有一位名叫王慧的姑娘便是其中之一。当年她曾经因为人生道路上的挫折陷入苦恼与绝望，甚至想早早地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是女排的拼搏精神鼓舞了她，是郎平的热忱感召了她，使她有了走向新生活的勇气。而今天，女排的偶像突然间倒塌，那些“内幕”都是真的吗？

她摇了摇头，不！她不愿人云亦云，她要亲自去了解，去调查，去追踪访问。她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结论，然后把它写出来！

真不简单！

那么我们呢？

二 郑美珠走了：留下的不止是遗憾

国家体委训练局五楼走廊里静悄悄的，体操队、排球队的运动员都正在训练场，只有501的房门虚掩着。

“你们好！”一位苗条清秀的姑娘离开堆满杂物的书桌，伸出手向我们走来。她，便是三天后即将“卸任”的房主人，我们早已认识却第一次见面的“中国姑娘”郑美珠。

趁她为我们拿饮料的工夫，我们打量起这世界冠军的单身宿舍：右边靠墙放着一张五十年代款式的旧单人床，米色碎花布的棉被和床垫显得很单薄。床头是一张简陋的三屉桌，上上下下推满了捆扎绳、报纸、纸盒……两个印有“China”字样的红色皮箱一竖一横地放在地板上，更多的诸如玩具动物、电子琴、装服装的大盒小包，都堆放在靠左墙的一张空床上，真给人一种大撤退前的感觉。

郑美珠和我们相对而坐。这位以球场上“机灵鬼”和“拼命三郎”著称的姑娘抿着福建人那种典型的丰满的嘴唇，两手抱起右膝关节，静静地看着我们。

“美珠！你比电视上高多了，也漂亮多了！”

郑美珠不好意思地浅浅一笑，依然是静静地，继续用柔和的目光表示着对我们来访的欢迎。

“行装打点好了吗？什么时候走？需要帮忙吗？”

“谢谢。还得过三、四天才能拿到机票。行李准备和侯玉珠的一起装一个集装箱运回去。”

“今后有什么打算，会出国吗？”

“很难说。不过很想读书。”

“杨锡兰、姜英都结婚了。你……”

“现在还不想考虑。”郑美珠淡淡地又若有所思地说着。我们忽然觉得问得有些唐突。事后我们才听说她在个人感情方面有过一些波折，命运对这位令人崇拜令人喜爱的姑娘真是不够公允。

离队会是四天之前开的。这是十年来中国女排最难堪最灰暗的送别会。一向不善言辞的郑美珠在会上动了真情，声音里有呜咽也有愤怒。

“我身体条件并不好，1982年前曾经三次离开国家队。不过我很幸运，是教练的培养，使我这个矮个队员成为国家队的一员，成为世界冠军。这次是我第四次，也是真正离开国家队，说起来真舍不得，可更有遗憾和伤心。我不明白的是小报上有那么多不负责任的报道，这叫我们如何回去见省里的领导和父老乡亲？”

在座的中国女排前领队张一沛宽慰她说：“我们体委可以开一张证明信。”

“证明信只有所在单位的领导能看到，对全国人民又如何交待呢？”

此时，郑美珠的心情已很平静。她摇头轻叹一声：“论

实力，我们本不该输成这样。想不到汉城成了我终生的遗憾。”她的额头使劲地低下去，都快低到了双手环抱起的膝盖，灰色的棉毛裤上印着的米老鼠因弯曲变型而显得可怕起来。

“○比三输给苏联队以后的那四十八小时可真难熬啊！”她忽然又轻轻抬起头，将下巴触及膝头，声音逐渐激动起来。”失去了争夺金牌的机会，五个老队员都把责任算在自己身上。因为从技术上看，我们知道有这个实力，心里那股难受劲，唉！没法说。整整四十八个小时，睡不着，吃不下。可是丢了毕竟拿不回来了，下面还有比赛要打，无论如何要为祖国拿块牌子呀！我们五个老队员是场上的核心，弄得不好就影响全队士气。我们当中的杨子（杨锡兰）年龄最大，她说，‘明天打日本，情绪一定要高。我最大，从我做起，我先喊叫，然后是美珠，按年龄排下去。拿不到铜牌，回去更无法向人民交待。’在场上，我们是不习惯叫唤的，可打日本那天，许多人说，咦！女排情绪挺不错呢！可又有谁知道支撑我们的是什么？

“说起来，一九八二、一九八四年我们也有过○比三输给美国的时候，袁指导和我们一样难过。可下场来他总是克制自己的感情，连夜找我们每个人谈心，分析战术，放下包袱。第二天，我们对战术心中有底，心理上的包袱放松了，不都是回敬了一个三比○吗？这次古巴不参加汉城奥运，形势对我们有利。苏联队做梦也没想到会拿冠军。我们同秘鲁那一场输得太窝囊，十四比九硬是拿不下那一分。打平了，李

指导才叫暂停，只是说拿下两分就好办了，可怎么拿？比赛这么激烈，场上怎么打，队员不可能象平时部署战术时那么清楚，需要教练在关键时刻点一下。过去袁指导叫暂停后往往只一句话，上场就灵。而这次心里没有底，稀里糊涂地把眼看要到手的成绩丢了。或许，李指导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赛，精神也很紧张吧！

“丢了秘鲁那场球，队员心里都不舒服。袁指导和毛毛（张蓉芳）提醒李指导找队员谈话，可他并没有来找过我。那晚我们一夜都没睡，第二天下午李指导让我们去活动活动，看看电视，可录相带得自己借，全是英文的，看不懂，也没心思。

“这次出征汉城，老觉得心里没有底。打排球光有实力不行，还得有战术。过去吧，不仅平时训练研究战术，赛前准备会都是队员谈各人的想法，教练归纳总结，然后制定战术。队员能清楚地领会教练的意图，各人怎么打心里也有数。可这一次，李指导让我们每个队员写设想，交给他，他一综合便成了他的战术部署下来，没有他的分析，也没有特点，每个队员怎么考虑的也不研究，稀里糊涂。就说打苏联吧，教练心中无数，赛前也没有针对性措施与应变措施，场上只会拿记事本跟我们讲。那种情况下，不是点睛之笔，怎么记得住？

“打完苏联队的第二天上午八点，我们几个一夜未睡，正在屋里坐着，李指导也来了，他没有说话，我们也只好散了。